

城市道教專輯

玉皇山道教近代以來之變遷*

韓松濤

摘要

玉皇山福星觀兵燹後於同治三年(1864)由蔣永林募資重建。晚清至民國時期，福星觀不但香火旺盛，且舉行過多次傳戒的活動，為江南道教著名宮觀。二十世紀初至五十年代初，福星觀由李理山主理。李理山精通道教齋醮、醫術、武術及數術，曾在杭州、上海兩地創辦道教會，為江南全真名道。李理山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與政府要員及上海等地著名商家都有往來，並舉行過多種形式的慈善活動，在當時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福星觀於1964年代被園林部門接管，於2004年交還由杭州市道協管理。近年來福星觀的齋醮活動與香火正在恢復，玉皇山道教正在走向復興。

關鍵詞：道教、玉皇山、福星觀、李理山、蔣永林

韓松濤，浙江大學圖書館讀者服務部、古籍特藏部副主任，浙江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兼任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道教史與目錄學。專著有《江西道教史》(合著)，論文〈張魯生平新考〉、〈《道藏》及藏外道書分類研究〉等。

*感謝論文評審人的意見，為本文在一些問題論述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上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幫助。

一、玉皇山歷史簡述

玉皇山又稱育王山，民國《杭州新志稿》稱：「玉皇山亦稱育王山，又名天真山，在九曜山南。高二二五公尺，為龍山之北支，壁立尖聳，特異諸山，登頂可覽江湖之勝，山頂有玉皇山宮。」¹《杭州府志》則直接稱其為育王山，其卷二十一〈山水〉稱：「育王山，在龍山峰之最高者，有登雲台，乃錢氏郊天之所，宋園丘亦在焉（一統志），俗稱鍋子山（萬曆錢塘縣志），在南屏山東山麓有從臣齋宿題名石刻，有鴻雁池，烏菱池，司馬溫公祠，今廢。下為耜田，名龜疇田。明為陽明書院（康熙錢塘縣志），山顛有玉皇廟，故稱玉皇山，亦云育王（神州古史考），廟外設七星缸，滿貯水其中，蓋地據一城最高處，以水制火亦厭勝之義（浪跡續談）。」²明末清初以前，玉皇山可能沒有後世這麼有名，只是龍山的一個山峰，故明末以前的地方志關於龍山的記述或都與玉皇山有關。關於龍山，《杭州府志》稱，龍山在錢塘縣南五里，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玉皇山之開山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年間（712–756），時「建玉龍道院，造大羅寶殿」。³五代時，「吳越王錢鏐造玉皇廟。宋仁宗年間（1023–1063）重開山，敕建玉龍道院」。⁴

南宋白玉蟾曾住持太乙宮，此事杭州之宮觀志有記載。《武林玄妙觀記》卷二有〈白瓊瑄仙師〉一篇，記其「嘉定中至臨安，上命館之太乙宮，嘗往來天慶觀與諸道流吟嘯，輒竟日。時高士陳永灝游武夷，仙師贈之以詩，未幾飄然而去」。⁵白玉蟾「住持太乙宮」在《西

¹ 千人俊：《民國杭州市新志稿》，卷二，頁十八，收入《杭州史地叢書》，第五冊（杭州：杭州圖書館1985年影印）。

² 清·龔嘉雋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國十一年鉛印本），《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一九九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第2冊，頁559。

³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9卷，頁444。

⁴ 同上註。

⁵ 《藏外道書》，第20冊，頁316。

湖遊覽志》中亦有記載。⁶玉皇山福星觀現在還存有「玉蟾還丹井」，此井原為古跡，後湮沒無存，民國時經李理山發現後重修，《杭州玉皇山志》卷八上有〈李理山重修玉蟾還丹井銘〉，敘述了其發現和建設還丹井的經過：

案玉蟾還丹井，在福星觀西院雙柱堂前。相傳為晉郭璞手鑿，後白玉蟾到此，煉丹上升，故名。原有碑銘毀於劫火，隻字無存，井亦湮塞。李紫東方丈主是觀，於夜間見瓦礫中有光爛然，跡之，見石甃隆起，知為井基。大喜，命工人淘至數仞，水忽湧出，甘澄逾于他井，大旱不竭。千年古跡，一旦復顯，洵可寶也。⁷

其井圈所刻之文即〈李理山重修玉蟾還丹井銘〉，其中有「郭公景仙，手鑿為井，養而不窮，其光環環。玉蟾長春，宋元代起，采藥棲真，煉丹於此」之句，其中玉蟾是指白玉蟾，而長春則是指邱處機。傳龍門派創始人邱處機在玉皇山「盡心窮理」，參透格物本來面目，建白華丹井。

明正德年間(1505–1517)，玉皇山有羅普仁(即無為教又稱羅教之羅清)苦修十三春，「大悟、小悟」多次，被封為無為宗師。明嘉靖年間(1522–1566)，敕建福星道院。據郁達夫遊記〈玉皇山〉記述的玉皇山道士口述之玉皇山的歷史稱：「這山唐時為玉柱峰，建有玉龍道院；宋時為玉龍山，或單稱龍山，以與東面的鳳凰山相對，使符郭璞『龍飛鳳舞到錢塘』之句；入明無為宗師，創建福星觀，供奉玉皇上帝，始有玉皇山的這一個名字。」⁸據此則玉皇山之名實始自明末，此為一說。據《杭州市志》則玉皇山之名始自清初：「清初，因當時山頂建造了規模巨敞的道教玉皇宮，山以宮名，始稱玉皇

⁶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七，頁88。

⁷ 〈李理山重修玉蟾還丹井銘〉，收入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卷八上，收入《西湖文獻集成》(杭州出版社，2004)，第21冊，頁759–760。

⁸ 郁達夫遊記：〈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彥編：《郁達夫說杭州》(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7修訂版)，頁12–15。

山。〕⁹因資料不多尚無法考證兩說究竟哪個準確。後於清雍正年間(1723–1735)浙江總督李敏達(李衛)聽道士言,在山巔開日月池,山腰置七星缸,造福星觀。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置七星缸。咸豐十一年(1861)道觀毀於戰火。¹⁰

二、蔣永林開創玉皇山基業及其傳承

同治三年(1864)蔣永林來玉皇山,苦心經營,得浙江民眾和浙江按撫使楊昌浚的資助,於同治九年(1870)建成七星殿、大殿、二殿、三清殿、斗姆閣、報平堂、客堂、方丈室、石碑坊、南天門等建築群,開堂掛單接待四方道士。民國三十四年(1945),蕭山來裕恂編有《杭州玉皇山志》,其卷十五云:

玉皇山之有福星觀,創建至今二百數十年矣,中經發匪燹燬,片瓦無存。咸同以前,道侶雜居,以正一派為多。庚申辛酉星散。同治紀元後,蔣真人開山募建,始純粹為全真正宗。

從上可知,全真龍門派居於福星觀,始於蔣永林。《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記有蔣永林事略:

蔣永林,道號長青子,浙江東陽縣人,為第十九代。幼即好道,父母為之授室,不願,避入普陀,後至天台山崇道觀,拜師冠簪。同治三年來省城之玉皇山。見山明水秀,結茅而居,供奉玉皇上帝。每辰無分,寒暑雨雪,日行數十里,虔拜靈官,於是長官感動,為建復七星缸、大殿、二殿、客廳。後復募建南天門、石碑坊、三清殿、三官殿、斗姥閣、報本堂、客堂、方丈室。遂乃開堂掛單,接待道眾,四方雲遊道侶,皆得暫息。駸駸有叢林之象。各處紳耆慕道而來,請往餘杭之洞霄宮、杭城之佑聖觀、鎮海之淵德觀、嘉興之玄妙觀、錢塘四鄉之東嶽廟,蔣師悉為之整頓規模,後均派徒分往管理。

⁹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第9卷,頁444。

¹⁰ 同上註。

據《玉皇山廟志》，蔣永林號玄晶子，¹¹此處稱蔣永林道號「長青子」，是其傳戒之道號，其傳戒法名稱「圓林」故又稱蔣圓林。蔣永林又有一號曰「四為道人」。¹²據《道統源流》記述「永」字輩為龍門第十八代，故蔣永林在龍門派中應為十八代，但此處所記為十九代，是其傳戒律師之系代，故蔣永林有龍門弟子十八代與傳戒律師十九代兩個系代。蔣永林創建玉皇山諸宮殿始自清同治三年(1864)。此處沒有提到蔣永林之卒年，但據《杭州玉皇山志·序》：「光緒二十二(1896)年丙申，蔣律師羽化，繼主觀務為紫東道人(即李理山)。」則蔣永林卒於光緒二十二(1896)年。

光緒七年(1881)，蔣永林赴北京白雲觀，從孟永才律師受戒。次年九月、十月在福星觀兩次傳戒，任方丈律師。九月份的傳戒，其它八大師分別是：證盟黃明蓮、監戒柯明超、保舉黃圓怡、演禮馬明和、糾儀張圓純、提科劉明誠、登錄朱明亨、迎請鄭明性。十月傳戒，證盟、監戒、保舉、演禮、登錄諸師未變，糾議劉明誠、提科洪明通、迎請曾明元。光緒十一年(1885)，蔣圓林在福星觀再次傳戒，此次傳戒的其它大師分別是：證盟朱明亨、監戒馮至安、保舉陳至峻、演禮範至受、糾儀儲明炳、提科吳至能、登錄鄭至珍、迎請陳明海、糾察陳明融、道值姚明亮、引禮儲明松和鄭明行。¹³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蔣圓林在玉皇山福星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傳戒，此次傳戒的其它大師分別是：證盟馮明安、監戒姚明亮、保舉方明根、演禮李明升、糾儀陳明誠、提科林明清、登錄沈明堅、迎請沈明福。¹⁴據杭州圖書館藏此次傳戒之《登真錄·玄都律壇浙江省古杭玉皇山福星觀傳戒錄(光緒丙申壇/科)》記載，此次傳與共有346名道教弟子。

¹¹ 卓炳森等輯：《玉皇山廟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5冊，頁1257。

¹²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802。

¹³ 同上註，頁801。

¹⁴ 同上註。

關於蔣永林之傳承，據《玉皇山廟志》〈監院師〉曰：

朱圓亨，平湖縣人。拜永林為師，光緒元年(1875)八月，師往洞霄宮大滌洞，圓亨接理福星觀監院，後派往諸暨牌頭鎮斗子岩龍王殿為住持。圓亨于同治十年(1871)辛未進京赴白雲觀受孟方丈戒律，考試張字第十六名，道號通徹子。

黃明怡，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人。系蔣永林徒孫。光緒四年戊寅歲往接佑聖觀監院，光緒六年(1880)庚辰歲，因朱圓亨往諸暨，蔣祖師須往鎮海、嘉興，明怡乃回玉皇山福星觀接理監院事。道號月中子。¹⁵

朱圓亨曾於光緒九年(1883)開壇傳戒。此次傳戒的其它大師分別是：證盟洪明通、監戒儲明安、保舉黃圓怡、演禮夏明馨、糾儀王明清、提科何明本、登錄金明純、迎請陳明海、糾察徐明真、道值葉明義、引禮呂圓功和杜圓修。¹⁶

據郁達夫〈玉皇山〉：「光緒年間，聽說曾經有一位監院的道士——不知是否月中子？——托人編撰過一冊薄薄的《玉皇山志》的，但它的目的，只在搜集公文案牘而已，記興革，述山川的文字是沒有的，與其稱它作志，倒還不如說它是契據的好。」¹⁷從郁達夫描述的「薄薄的」、「只在搜集公文案牘而已」來看，其所稱的《玉皇山志》是卓炳森所編的《玉皇山廟志》。卓炳森續中所稱編志為「光緒七年(1881)」，¹⁸而月中子黃明怡任監院為光緒六年(1880)，故郁達夫所記人名無誤，月中子確實編過一本志書，不過書名應是《玉皇山廟志》。

《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法嗣·分支各師〉曰：

葉圓義，杭州府富陽縣人，係蔣永林之徒，時圓義之徒何明德分在杭州白馬廟巷內通玄觀，又周明月在黃天蕩聖帝殿，均募重建。

¹⁵ 卓炳森等輯：《玉皇山廟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5冊，頁1258。

¹⁶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801。

¹⁷ 郁達夫：〈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彥編：《郁達夫說杭州》，頁12-15。

¹⁸ 卓炳森等輯：《玉皇山廟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5冊，頁1238。

褚圓澄，系女道姑，錢塘縣人，蔣祖師之徒，在杭城上板兒巷建玉清宮。

林明盛，義烏縣人，系朱圓亨之徒，在海甯長安鎮玉宸道院。

楊明溪，鄞縣人，系朱圓亨之徒。

上述所錄為《杭州玉皇山志》中蔣永林所傳之弟子，而《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法嗣〉中實際收錄在杭州及附近縣市的圓字輩道士共34人，明字輩道士共9人，因非蔣永林之徒，故均未錄。但上述〈分支各師〉所錄4人似都與玉皇山無關。

除上述《杭州玉皇山志》所記傳承外，《道統源流》一書中亦提到了玉皇山的傳承。民國時期，湖州金蓋山古梅花觀編有《道統源流》一書，其中《道統源流志（下）》一篇中有金蓋山龍門派的傳承，記至第二十五代「信」字輩，可以看作是《金蓋心燈》的續作。其中第十八代、十九代、二十代有「外傳」數人，其中記有與玉皇山有關的有四人。分錄如下：

外傳第十八代

蔣永林律嗣 浙江金華人，壯歲皈玄，後詣京師白雲觀迭受大戒，返至杭州玉皇山，於光緒壬午癸未屢開壇說戒。曾任湖州弁山佑聖宮方丈。

外傳第十九代

朱圓亨律嗣 浙江平湖人，受蔣永林宗旨，後亦在玉皇山開戒傳道。

褚圓炳律嗣 浙江歸安人，居弁山佑聖宮有年，後為主席。系蔣永林傳法。

第二十代

孫明清律嗣 浙江歸安人，在杭州玉皇山受戒，啟河口山頂武聖宮，興建有力，系褚圓炳傳。¹⁹

¹⁹ 〈道統源流志（下）〉，莊嚴居士編：《道統源流》（民鐸報社、古梅花觀、各支分壇發行，1929），頁86-87。

從《道統源流》記述來看，蔣永林和朱圓亨應該屬於玉皇山福星觀的道士，而褚圓炳和孫明清都是與玉皇山略有關係。其中褚圓炳是蔣永林的親傳弟子，並長駐在蔣永林任過方丈的湖州弁山佑聖宮。孫明清是褚圓炳所傳之弟子，但只是在玉皇山受戒，而後離開玉皇山，「啟河口山頂武聖宮」。

關於蔣永林之傳承，筆者於2009年農曆七月十五，在玉皇山福星觀作田野調查時，找到了為其弟子所承認的玉皇山的傳承。是日，觀中作七月十五日超度亡靈之齋醮儀式，觀中列出了很多靈位，其中包括了福星觀近幾代羽化的祖師、先師之靈位，將這些靈位記錄下來，則就有了福星觀自晚清以來的傳承。

在列靈位的壁上，有閻王像，其下分左中右三部分排列靈位，其中間部分共有二十六塊靈位，都是關於福星觀或相關教派的靈位。靈位分上下兩排，靈位情況見表一，因為所有落款均為「陽上玄門弟子高信一率杭州市全體道眾奉祀」，故省略。

在其他兩處還有兩塊關於同一位龍門道士的靈位：

一塊為「昇度龍門正宗第二十四代上誠下寶黃大煉師之靈位 陽上玄門弟子高信一率杭州市全體道眾奉祀」。

一塊為「昇度龍門正宗第二十四上誠下寶黃大師之靈位 陽上孝徒王信光奉祀」。(見表一)

總結上述記錄，玉皇山龍門派晚清以來傳承如表二：

表二：近代以來玉皇山龍門派傳承表

| 代 | 道士 |
|-------|--|
| 第十八代 | 蔣永林 ²⁰ |
| 第十九代 | 朱圓亨 |
| 第二十代 | 黃明怡 |
| 第二十一代 | 晁至祥 |
| 第二十二代 | 張理太 ²¹ 、李理山、盛理旺(女)、王理蓮(女) |
| 第二十三代 | 呂宗柔、陳宗雲、王宗真、袁宗凱、包宗德、呂宗安 ²² 、李宗洛、高宗寶、王宗覺 |
| 第二十四代 | 王誠顯、周誠養、朱誠明、黃誠寶 |
| 第二十五代 | 高信一、王信光(黃誠寶之徒) |

2009年七月十五所祀靈位中第二十代是空缺，第二十代黃明怡據《玉皇山廟志》補，第二十二代張理太據《當代日報》補，除此之外，上述名單均出自所祀靈位。

根據靈位所記，李理山尚有師兄弟(姊妹)三人，為張理太、盛理旺、王理蓮。宗字輩有九人，誠字輩有四人。信字輩知道姓名的有兩人，一位是現道協會長高信一，而另一位是王信光，且都自稱為「陽上」，則均在世。杭州有道士王友根，筆者曾於2009年上門尋訪，但據其所住過的樓宇之物業管理處稱，其早幾年把房子變賣後，已經搬走，故未謀面，王友根或即是王信光，王友根為俗家姓名，信光為道號。

²⁰ 此處按其龍門第十八代計。

²¹ 據《潛伏道教匪特李理山就逮後道教徒一致表擁護並集會控訴李匪的種種罪行》增加，文見《當代日報》1951年4月24日第二版。具體討論見下節〈李理山小傳·生平事蹟簡述〉。

²² 李理山平反案，呂宗安曾提出上訴，高宗葆(西湖區法院檔案室所藏之檔案為「葆」字)曾撰寫〈幾點意見〉，現相關卷宗藏於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

靈位中尚祀吳山正一法派、佑聖堂。按吳山即杭州城隍山，靈位中有吳山正一法派的兩位道士的名稱，分別是：朱師明、曹國政。據民國三十五年(1946)〈杭州道教會發起人名單表〉，朱師明，男，杭縣人，當時年齡31歲，為吳山城隍廟右司住持。而李理山亦是杭州道教會的發起人之一。

杭州以前有佑聖觀，現在杭州上城區尚有佑聖觀路。筆者小時候就在杭州佑聖觀路小學上學。此處稱福星觀和佑聖觀都稱「堂」，其他如杭州曾大為有名的龍門金鼓洞支派，在《金鼓洞志》中也稱自己為金鼓堂，則福星觀和佑聖觀都可能曾是龍門支派的所在地。據《杭州市道教會全真會員名冊》(三十五年十一月)，²³王理蓮(女)為佑聖觀住持，盛理旺(女)也駐於佑聖觀。名冊中又有梁理素(女)為佑聖觀知客，則當時佑聖觀應為坤道院。

光緒二十二(1896)年丙申，蔣律師羽化。約十年以後，紫東道人(即李理山)繼主觀務，從此玉皇山開始了李理山之時代。

三、李理山主理玉皇山半個世紀

據筆者所知，因傳世文獻較少，尚未有專門針對李理山的研究出現。本文將根據所掌握的文獻和檔案資料，試對李理山及其主理之玉皇山做一個較為詳細的論述。

(一) 李理山及玉皇山之文獻資料

李理山的生平文獻資料經過收集，主要有以下一些：

1. 蕭山來裕恂編纂《杭州玉皇山志》共十九卷，有杭州市圖書館1985年影印本，也被收入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西湖文獻集成》第

²³ 杭州市檔案館藏。

21冊，簡體橫排。

2.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所藏檔案資料。為李理山反革命案及平反判決和申訴資料。主要有〈(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李理山上訴狀〉、〈一九五六年度杭法刑上字第228號〉、〈高宗葆一九八六年關於玉皇山李理山案幾點意見〉、〈(1987)杭法刑監字第61號〉等。

3. 上海檔案館所藏檔案資料。主要有〈呈上海社會局開辦玉皇山分院申請表(1946)〉、〈上海玉皇山分院登記表及證書等〉、〈上海市道教會名單〉等。

4. 杭州檔案館資料，主要有〈杭州道教會章程〉、〈會員名冊〉等。

5. 杭州之《當代日報》與《正報》中的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前期的相關新聞及報導。

6. Peter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該書有中譯本：〔俄〕顧彼得著，和曉丹譯，《神秘之光——百年中國道觀生活親歷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譯本。) 內容包含了俄國人顧彼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玉皇山親歷事件的記述。

7. 中華書局1997年出版《杭州市志》第9卷〈民族宗教篇〉中〈道教〉一節。內容較為豐富，包含有杭州道教概況，各主要宮觀概況，杭州市道教會情況及1950年杭州宮觀調查表等內容。

8. 上海《靜安區志》中〈道教〉一節。較為簡略，因李理山上海所設分院在靜安區中，故有部分相關內容。

9. 其他文獻：李理山「丹井書屋」文獻兩則。(1) 王松泉：《民國杭州藏書家》。收入《杭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杭垣舊事》，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浙內圖准字第(2001)114號，2001)，頁36-37。(2)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下冊，頁704。郁達夫遊記：〈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彥編：《郁達夫說杭州》(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頁12-15。

(二) 李理山小傳

1. 生平事蹟簡述

李理山，號紫東。《杭州玉皇山志·序》曰：「道人姓李，名理山，紫東其號也。」故李理山也稱李紫東。

李理山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據上海市檔案館所藏之民國三十五年(1946)二月之上海市社會局「杭州玉皇山福星觀道院登記表」所填李紫東為「七十四歲」。又據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所藏之《(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1955)李理山為「83歲」。依杭州風俗，所稱歲數一般用虛歲，即出生之年為一歲，以後每加一年則加一歲，故李理山當出生於1873年。

李理山祖籍江蘇南通，上海市社會局《杭州玉皇山福星觀道院》登記表李紫東為「江蘇南通縣」²⁴人，而據〈杭州市道教會名冊〉及〈上海市道教會名冊〉所填李理山籍貫均為「南通」。《杭州玉皇山志》卷序中亦稱「道人姓李，名理山，紫東其號也，籍南通」。故李理山籍貫應為江蘇南通縣人。〈(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²⁵稱其為「江蘇鎮江」人，不知何據。又有稱李理山字紫東，號徂徠，河北人，則不詳其所出。²⁶

《杭州玉皇山志·序》稱李理山為「本觀弟子」，故李理山應是在福星觀出家之弟子。出家時間據李理山〈上訴狀〉自稱為「光緒二十六年來杭州束髮為道教徒」，則是在1900年。²⁷李理山之師或為晁至祥。據2009年農曆七月十五，福星觀所供奉之靈位，李理山為

²⁴ 民國時廢州、市，只設省縣二級，故南通縣實際相當於現在的市。

²⁵ 杭州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

²⁶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下冊，頁704。據顧志興所述，其「李理山字紫東，號徂徠，河北人」是據張崑《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

²⁷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藏李理山〈上訴狀〉。

龍門二十二代，二十一代「至」字輩只供奉有晁至祥一人，故推測李理山之師為晁至祥，但不確定。²⁸

關於李理山主玉皇山觀務的時間，《杭州玉皇山志·序》曰：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蔣律師羽化，繼主觀務為紫東道人，道人姓李，名理山，紫東其號也。籍南通，本觀弟子，中年曾雲遊四方，民國八年己未，道眾公推為本觀方丈，受任以來，即力圖恢廓，始則修山路、砌山墻而造山寺，作山房，後乃築亭疊石，佈置井然。其次則開紫來洞，闢太極園。

以上文內容觀之，文有歧義。從第一句看，似乎是李理山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蔣永林羽化後，就主福星觀之觀務。但一是此時李理山才24歲，且蔣永林之後有圓字輩、明字輩、至之輩，之後才是理字輩，為何蔣永林羽化後，會將觀務交於後自己四輩的年輕弟子？這是非常有疑問的。

而從後面的「中年曾雲遊四方……」一段文字來看，則似乎李理山於民國八年（1919）就任方丈後才主持觀務的，民國八年時，李理山為47歲，雖然合於其「中年曾雲遊四方」後回觀任方丈的情況，但一般材料均記述其年輕時即主玉皇山觀務，故不能就此文認為其在民國八年就任方丈後才主持觀務的。

據上海檔案館所藏之上海社會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上海道教會登記表」，「理事長李理山」之履歷為「杭州玉皇山住持四十年」。以《杭州玉皇山志》所述李理山任住持為民國八年，即便是舉約數，到民國三十六年也只有近30年。據《杭州市志》，蔣永林羽化後，其

²⁸ 據呂宗安1985年5月28日為其師評反而提交給「上海市宗教局領導同志」的〈報告〉稱李理山從小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觀出家，而據杭州市道協高信一道長稱，李理山出家入道並非在福星觀，其師父也非晁至祥。綜合來看，李理山在福星觀出家應以呂宗安及《杭州玉皇山志》所述為準，而晁至祥非李理山師父的意見值得重視。晁至祥名字出現在奉祀靈位中，如不是李理山之師，則其當是朱圓亨之後，李理山之前福星觀中頗有地位的人物。

弟子朱圓亨主觀務，²⁹其時間是光緒二十二年。又據呂宗安稱，李理山於1913年起就做了福星觀的當家。³⁰而據《當代日報》稱：「大王廟的蔡理清控訴說：遠在一九一八年，玉皇山前住持張理太就是被他用種種威脅的手段趕出去的，從此他就以住持自居。」³¹

根據上面所有的文獻推測如下：主持觀務的朱圓亨或其繼任者任命張理太為福星觀住持，而任命李理山負責具體事務。以1947年時，李理山為「杭州玉皇山住持四十年」推測，李於1907年35歲左右時開始主觀務。而後於1913年起成為「當家」，也即從此時起基本掌握了觀中的事務，其職務或是「監院」。³²此後李理山與住持張理太起了爭執，於1918年將張理太趕出了福星觀，並於第二年，即民國八年時被推為方丈。

李理山1927年左右開始收書，藏書室名為丹井書屋，藏書中有天問、占候、堪輿、奇門、六壬等六大類之書。抗戰起，停止買書。³³或是因開辦難民所經費緊張所致。

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正乙派與全真派聯合組織杭州道教會，會長為李理山，會址在江幹區十五奎巷玄妙觀內，日軍侵佔杭州時解散。³⁴

杭州淪陷時期，李理山曾於1938年辦難民所，據《杭州玉皇山

²⁹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第9卷，頁444。

³⁰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藏呂宗安為其師評反而提交給「上海市宗教局領導同志」的〈報告〉。

³¹ 〈潛伏道教匪特李理山就逮後道教徒一致表擁護並集會控訴李匪的種種罪行〉，《當代日報》，1951年4月24日，第二版。

³² 據一份「據呂宗安〈回憶抗日戰爭期間玉皇山紫來洞改作難民所的經過〉及閔智亭道長所述李理山生平編寫」的《李理山》資料稱，李理山職務為「杭州玉皇山福星觀監院」。

³³ 王松泉：《民國杭州藏書家》，收入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杭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杭垣舊事》（浙內圖准字第(2001)114號，2001），頁36-37。

³⁴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第9卷，頁447。

志》卷十八〈主管分院〉，稱「在杭州辦理難民收容所，陸續收容難民總數達七千餘人」，³⁵約艱難維持了一年多，因「時局稍靖」，「遂行解散」。因為開辦難民所而導致經費不足，故李理山於1939年赴上海開辦分院。據《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先是己卯（1939）曾設立分院，於上海西摩路底，已於是年五月開辦，嗣因地偏屋隘，善信往來不便，復於次年（1940）庚辰，在武定路籌設分院，人皆稱便，即於是年修建落成，八月吉日開光，以此院為第一分院，以彼院為第二分院。」因開辦難民所，李理山與紅卍字會有來往，其具體連絡人是翻譯章蘭亭。³⁶通過紅卍字會與日寇進行交涉，通過封鎖線將糧食運上玉皇山供應難民。

抗戰勝利後，杭州與上海兩地均恢復成立道教會，民國三十五年（1946）11月，恢復杭州道教會，會長李理山。會址在湧金門金華廟內。三十八年（1949）3月，改選理事會，李理山為理事長。1947年3月15日，在正一天師張恩溥的組織和倡議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市道教會」，李理山任理事長。一般都認為李理山與張恩溥並為全真與正乙兩大宗派江南之道教領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原道教會停止活動。1950年2月，籌備杭州道教協會，有理事21人，主任李理山，會址在杭州湧金門金華廟內。

1951年4月16日，因私藏槍枝3枝及子彈110發等問題，李理山被杭州軍管會逮捕。並於1955年12月2日判有期徒刑15年。因沒有安排人民陪審員組成審判庭進行審理，導致程式不合法，於1956年4月7日發回重審。李理山於1956年6月16日寫成〈上訴狀〉為自己

³⁵ 「收容難民七千餘人」為各種資料所引用。但同書卷十七〈善舉〉又記為「三次收容難民，第一次三千餘人，第二次一千二百餘人，第三次一千四百餘人。」則三次相加為五千六百餘人。可能是此三次是規模較大的三次收容，其餘平時尚有零星收容之難民，故有七千之數。

³⁶ 據杭州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

申辯，並稱自己「腳部癱軟無力，難於行走，慢性腸炎尚未根除」，³⁷法院於1956年10月22日判徒刑10年，且判沒收財產不予發還。其法定釋放日為1961年4月15日。³⁸未到釋放日，李理山即卒於獄中。關於其確切的卒年沒有紀錄材料。一般均稱其在1956年判決後「不久病故於獄中」。

1985年，李理山之徒呂宗安，時任上海市宗教學會會員，上海市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多次向杭州西湖區法院去信申訴，李理山的另一徒弟高宗寶也於1986年11月5日寫了〈關於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一案本人以下幾點意見〉，替李理山申辯。西湖區法院先是於1986年12月25日對原判決「予以糾正」，後又於1987年4月16日發〈(1987)杭法刑監字第61號〉終審判決書，「對李理山反革命案予以糾正。本件系終審判決。」³⁹

2. 道術與方術

李理山為一代道教領袖，自幼在福星觀修道，他既精道教齋醮科儀，又擅長醫術，且精道教內家拳技，體魄矯健，對於奇門等數術亦有研究。從各種文獻的記載來看，李理山所學之道術與方術較多，分述如下：

(1) 齋醮科儀及道術

李理山精於齋醮科儀，《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齋醮〉就記述了玉皇山及上海分院舉辦的經常性或臨時性的齋醮。經常性的有「皇經勝會」，「皇經者，高上玉皇本行經也」。⁴⁰因福星觀主要供奉玉皇上

³⁷ 杭州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李理山〈上述狀〉。

³⁸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一九五六年度杭法刑上字第228號〉。

³⁹ 此段文字中數個檔均藏於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

⁴⁰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09。

帝，故經常性舉辦的即是玉皇本行經之齋醮，最隆重的是每年正月初九玉皇聖誕日，而每月初九亦「齋供禮拜，依科祈禱」。玉皇山福星觀臨時舉辦之金籙大醮多達數十次，《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所記主要有：1939年「杭州玉皇山上海分院祈禱平安日道場」，「祈禱世界太平特設八一大醮」等。

李理山在齋醮中，往往是主持者。據當年與李理山交往過的俄國人顧彼得*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一書就記有一次李理山主持的齋醮儀式：

今天夜裏有一場重要的法事，是那位老婦人專門為她的亡夫祈求安息的。……十一點剛過，一名法師敲響了青銅鐘，它緩慢的節奏顯示了不同尋常的威嚴。兩隊道士和著鐘的節拍從左右側廊裏魚貫而出走向大殿。每一個道士都穿著華麗的深紅色法衣，頭戴黑絲道冠。李住持走在最後，他穿著金色法衣，頭戴鑲嵌了寶石的的道冠……李住持雙手握著他的白玉笏板，向玉皇上帝叩拜後，用響亮清澈的聲音祈禱：……⁴¹

李理山的道術，主要是*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中記述的李理山之徒弟呂宗安、高宗寶等人進行的一個「續命燈法」(Lamp of life)的法術。

這個法術的緣起是「(上海)老茶商王先生的長子。他已經病了幾個星期，外國的醫生都沒有辦法了，認為他可能會在今晚死去。他的家裏人請我們幫助他」。儀式的時間是「晚上八點鐘，我們要為他點亮一盞燈」。法術中的「一個大黃銅碗裏的油燈，被一個深筒狀的玻璃罩罩著」。

儀式的過程很曲折，開始時，「他們三人繞著油圍成一個圈，精

⁴¹ 原文為英文，見Peter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106-107。此處為作者翻譯。譯文參考了該書中譯本：〔俄〕顧彼得著，和曉丹譯：《神秘之光——百年中國道觀生活親歷記》(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下同。

神全然集中，輕輕唸著咒語」。但中途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難，「……火星還在縮小，似乎就要滅了，又燃起了一個亮點」。不過最終這次法術成功了。「他們三人摒住呼吸站在那裏，他們的意念完全收斂於自身。午夜過後，淡藍的火星開始哧哧忽閃，我看見它更亮了。慢慢地，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光亮就像是在成長，直到最後變成一個金色的火苗，依然很小，但卻明亮而平穩。『危險過去了，他現在睡著了。』宗安(Chung An)喃喃低語。三人雖然疲倦地坐到凳子上，但為他們努力挽救了一個生命感到高興。」這次成功也得到了病人家人的確認和感謝，「次日晚上，王先生的家裏寄來一封電報，就是病人已經恢復過來，並感激這座寺觀」。⁴²

據我的瞭解，這個法術似乎不是一個治病的法術，可能是一個續命的法術。筆者曾在峨眉臨濟門掌門人傅偉中先生處瞭解到他會一種「奇門借壽法」的法術，其作用是借壽續命，儀式所用的方式為共點燭八枝，周圍七枝以象北斗七星，中燃一枝為本命之光，另外要使用水晶球和香爐之物。這個儀式與上述玉皇山的「續命燈法」的法術有共同之處，故有上述的推斷。

(2) 醫術

李理山會醫術，《杭州玉皇山志》卷二十〈志餘·于異人〉記載了李理山之醫術傳承：

于昌瑞，字教海，湖北人。弱冠隨左宗棠軍營效力，以功漸升至統領，在新疆軍台，亦有年所。後起功成身退之念，投卜喀塔山修道。紫東游陝西時遇之，年已九十餘。能以針治病，陝西人稱為神針于瘋。紫東師事之，學得針法，亦能診療。後于來浙，曾到玉皇山數次，其人行路如飛，從上海至杭，歷四時而至云。⁴³

⁴² 參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60.

⁴³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56。

《杭州玉皇山志》記載李理山中年曾雲遊四方，此於昌瑞當是其中年雲遊至陝西時所拜之師。

(3) 武術

李理山亦會武術，現任玉皇山住持高信一也曾提到過李理山會武術之事。顧彼得也曾記載其親眼所見李理山之徒擊劍之事：「小道士拿來兩柄古劍，宗寶 (Tsong Poo) 和另外一個道士開始擊劍，為大家提供一個飯後消遣的節目。」⁴⁴

王松泉記李理山曰：「幼喜習拳，造詣之高，蜚聲武林。大江南北四方從學之人甚多……由於道長精通拳術，雖老而氣足神旺，每日上下山崗，別人氣喘如牛視為畏途，道長卻神態自若如履平地。夜間不上床眠臥，通宵盤膝靜坐。」⁴⁵王松泉1913年生於紹興，1928年起到杭州舊書店抱經堂做學徒，⁴⁶而李理山自1927年起十年內為杭州抱經堂之常客，故王松泉與李理山應是熟識，其記載當無誤。

(4) 數術

據記載，閔智亭年輕時曾於1947年至玉皇山福星觀拜訪，⁴⁷並師從李理山道長學習天文星象學及奇門遁甲，則李理山於數術亦有相當的研究。⁴⁸顧彼得記載了李理山對其的預言，如果李理山之預言從

⁴⁴ 參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02.

⁴⁵ 王松泉：《民國杭州藏書家》，收入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杭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杭垣舊事》，頁36-37。

⁴⁶ 王巨安：〈杭州舊書業三傑考述〉，《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7年第3期（總第111期），頁60-64。

⁴⁷ 張興發：〈仙蹤渺黃鶴人事憶白蓮——記中國道教協會會長閔智亭大師〉，《中國宗教》，2004年第1期，頁1-4。

⁴⁸ 近日遇到閔智亭徒孫嘉一道長，稱閔道長傳下來一幅星圖，與《中國古天文圖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第131頁所收「浙江杭州玉皇山李紫東石

道術中來，則李理山之內丹之學應該有相當之基礎。不過由於李理山會星象及奇門，此預言或是李理山從顧彼得的八字或面相手相中來，故歸於此處。

李理山對顧彼得的預言是：「現在不要想離開上海到陌生的地方去，你現在的工作是好的，儘可能地堅持下去。以後你會從一位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手上得到一個很好的職位，像秘書那樣工作——我不能說得很清楚。你會去中國的西部，在那裏你會找到一直在追求的東西。你會快樂的，儘管你會遇到麻煩和危險。你應當磨練忍耐力和審慎的觀察力，保持一顆和平的心。」幾年後，李理山的預言得到了證實，顧彼得記述道：「幾年前李住持向我預言的一切得到了證實。1939年，通過孔祥熙的夫人，一個在當時的中國最有權力和影響的女人，我被派往西藏邊境開創中國工業合作社。」之後，李理山又對顧彼得將來的事進行了預測，說「顧彼得的的生活有週期地進行著變化，每過七年將會有一次新的變化」。⁴⁹雖然顧彼得沒有說這段預言是否準確，但從顧彼得著書中寫到這段故事來看，則無疑李理山的這段預言也是準確無誤的。

(5) 道經研究與道教發展計劃

李理山對道經的研究有相當的水準，據民國杭州道教會的名錄，全真會員名單中有學歷一欄。學歷分為研究教義、粗識經義、略識經義、粗識文字四個等級。87名會員中，研究教義者僅有一人，即福星觀方丈李理山。也就是李理山對道經與教義的研究達到了「研究」的水準。我們從《申報》的一則新聞中可得到旁證。《申報》民國十九

刻天文星圖碑」相同，所傳星圖比照片多一首步天歌。並題由「李理某」所授。嘉一道長認為，由於李理山當時被打成反革命，因避嫌故將山字寫成其他字，該圖實是李理山所授。由以則多一實物證明李理山授閱智亭天文星象學之故事。

⁴⁹ 參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65, 170.

年(1930)3月28日有〈志管先生之喪〉一文，其中稱：

無錫管趾卿先生為實業界先驅，任西門子洋行華經理職垂二十年，遇事決斷，片言立辨，德人素驕誇，對先生則無不心悅誠服。非先生之天賦異稟，其烏能臻此。不幸去歲為病魔所擾，於臘尾遽歸道山，生平樂施與，性慷慨，其作古也，識與不識，莫不悼之。

二十三日為開奠出殯之期。黃陸路上，素車白馬，途為之塞，弔者千人。王正廷、虞洽卿等與焉。喪居自走廊以至廳堂滿懸挽聯綢幛。挽語以玉皇山福星觀主持李理山一聯為最長。句云：「公為世福星，仁恩普被平生已溺已飢，好施不倦，僉謂吉人天相，必享遐齡，何期數載沉痾，終乏靈丹，竟棄塵寰悲永訣。天奮我同志，中路淪亡十年相扶相助，護道彌虔，素欽玄旨精深，定操善果，他日三生石畔，重逢舊雨，毋忘風月證前因。」書於丈匹綾絹，字亦不俗。……

文中死者管趾卿先生雖然稱其為無錫人，但從「王正廷、虞洽卿等與焉」可以看出，其葬禮所在地當是在上海。則無錫當為管趾卿的故籍。文中稱李理山所寫之挽聯為此次葬禮中最長的，從其實際內容看，其文采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故用此來旁證李理山於道教教義達到研究水準，至少從文字功底上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其次，從李理山敬贈挽聯也可以看出李與死者生前關係應該相當不錯。則李理山與上海實業界關係應該相當深入，這是李理山社會影響力的一個旁證。

對於道教的發展，《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九有〈廣教〉一篇，應是李理山為發展道教提出的舉措，舉措共分八條，分別為：成立道教會、道教講經壇、道學研究院、道教居士林、道教各報社、道教圖書館、道教救濟會、道書流通處。⁵⁰從這些舉措來看，很多都是符合當時時代發展的。不過從實踐情況來看，僅僅成立道教會是實現了，道教救濟只是以各種方式在實行。對於其餘各項，李理山本是

⁵⁰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45-948。

有打算的，《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西湖烏石峰金鼓洞〉一節中提到：「又擬將金鼓洞地方作為道教居士林。將舊有殿寧修葺，再建新寮，供居士齋宿、講道之用。甫欲興工，而國難作，事遂擱置。」⁵¹如果該處實現李理山之計劃，則道教居士林及道教講經壇或已有了著落，不過由於抗日戰爭爆發，計劃被擱置。而其餘幾項也都未能實現。

3. 交遊與任職

(1) 與道教界的交往及創建道教會

李理山作為江南道教的領袖人物，與道教人物多有交往。根據文獻他與張恩溥、陳櫻寧等道教名人都有交往或合作，並創建了杭州與上海兩地之道教會。

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正乙派與全真派聯合組織杭州道教會，會長為李理山，會址在江幹區十五奎巷玄妙觀內，日軍侵佔杭州時解散。⁵²民國三十五年(1946)11月，由於抗戰的勝利，恢復了杭州道教會，會長仍是李理山。會址改為湧金門金華廟內。據〈杭州市道教會正乙會員名冊〉(三十五年十一月份)，正一會員96人；〈杭州市道教會全真會員名冊〉(三十五年十一月份)，全真會員85人。⁵³

1946年冬，為發展道教，鞏固嗣漢天師的地位，張恩溥在上海三茅閣延真觀邀集道教界名流開會，標榜以「宗教為重，團結為重」，消除宗派之間的不和、成見和歧視，提出先建立由地方主要道觀主持的地方道教會，再建立他主持的全國道教會。依靠杭州玉皇山福星觀上海分院住持李理山的經濟和人力支持，同時依靠當時上海民政局長張曉松在政治上的幫助，1947年3月15日，成立了「上海市道教會」，該會以「研究玄學，闡揚教義，刷新教務，聯絡道友感

⁵¹ 同上註，頁923。

⁵²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第9卷，頁447。

⁵³ 杭州市檔案館藏。

情，發展宗教事業」為宗旨。李理山任理事長，保安司徒廟住持正一派張維新、桐柏觀住持全真派艾朗軒、松靈道院正一派王朗泉、清虛觀住持全真派嚴洪清等為常務理事。另設理監事和後補理監事29人，包括陳蓮生、李錫庚、陳鐵海、呂宗安、張源錕等，又設秘書、書記、會計各一人，會計為李理山之徒吳宗起。⁵⁴

同年4月，也就是上海市道教會成立一個月，該會就印發了由陳櫻寧起草的〈復興道教計畫書〉。計畫書提出了「講經、道學研究、報刊、圖書、道書、救濟、修養、農林、科儀」等九個方面的復興道教的計畫。這份〈計畫書〉出自陳櫻寧的手筆，足見其在該會中的精神地位是相當高的。⁵⁵而作為理事長的李理山，當與陳櫻寧有較多的交往。

1947年秋後，張恩溥與李理山協商發起組織全國性道教會，張恩溥要求籌集經費由上海市道教會承擔，全國道教會由他負責，李理山同意上海市道教會承擔經費，但全國道教會要由他負責，張恩溥協助。二人意見對立且互不相讓，此事遂成為泡影。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道教會自行宣告解散。

(2) 擔任紅卍字會的會長

據李理山〈上訴狀〉自稱，其「抗戰前至勝利時擔任杭州上海道教會理事長、杭州紅卍字會長等職」。⁵⁶杭州淪陷時期，李理山因辦難民所事項，通過紅卍字會翻譯章蘭亭與日軍聯繫。⁵⁷

紅卍字會，又稱道院。1916年，山東省濱州市人吳福永創立「道院」，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1921年錢能訓、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組織紅卍字會籌備處，以「促進

⁵⁴ 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道教會理監事履歷表》。

⁵⁵ 劉延剛：《陳櫻寧與道教文化的現代轉型》（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頁206。

⁵⁶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藏李理山〈上訴狀〉。

⁵⁷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

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其旨趣，後由國民政府內政部批准成立。道院與紅卍字會是合二為一的表裏組織，道院重內修，紅卍字會則著重推展慈善事業。

山上開辦難民所最需要的就是糧食，由於糧食為戰爭時期的軍需品，所以在敵佔區運糧是寸步難行的。由於語言不通，李理山請章蘭亭出面打交道、開證明，還要巧作掩護，才能把救濟糧送上山。或是章蘭亭抗戰勝利後已經被認定為漢奸，故在李理山判決書中有「以辦難民所為名，與漢奸翻譯章蘭亭勾結」⁵⁸一條罪狀。關於開辦難民所的具體事宜見下文福星觀善舉一節。

(3) 與政府要員的交往

李理山與當時政府要員多有聯繫，李宗仁、蔣經國、何應欽、白崇禧、朱家驊、胡宗南、宣鐵吾、余漢謀、叢鳴濤、沈鴻烈、羅霞天、王雲沛、鄭文隱、毛萬里等人均遊歷過玉皇山，而李理山則「殷勤招待」。⁵⁹李理山又與蔣經國、余漢謀、竺鳴濤等共同攝影留念。而這些照片在1955年李理山判刑時，還被用作證據。故1986年高宗葆在〈幾點意見〉中的第五點意見，就提到了蔣經國與李理山合影的問題，稱當時李理山坐而蔣經國站，是蔣尊老。⁶⁰與李理山關係較為密切的是軍統杭州站站長章微寒及其私人秘書趙淑良，李理山收其二人為「道教歸依弟子」。

4. 李理山之丹井書屋

王松泉初時為杭州抱經堂之學徒，滿師後任修復部主任，自1928至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高宗葆一九八六年〈關於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案幾點意見〉。

1932年在杭州抱經堂任職，與經常至抱經堂購書之李理山相識。其寫有《民國杭州藏書家》一書，記述了李理山之藏書情況：

李理山藏書室名「丹井書屋」。民國16年(1927年)左右開始搜書，足跡遍及杭市各書肆，為城站「抱經堂」常客。因去來頻繁，店主朱遂翔接待如上賓，故稀見之書輒留以待。日積月累，所藏漸豐。尤喜收購有關天文星象之舊抄本，不惜重價，廣為羅致。藏書中有天問、占候、堪輿、奇門、六壬等六大類之書，均系明版舊刻舊抄少見之書。數年之間，耗資數萬元。如此購書，在杭城舊書業中咸認為罕見。道長還邀請精於修書之人整修裝幀，編制分目，實嗜書有癖之一奇人也。抗戰起，停止買書。……紫東先生之藏書，1952年由浙江圖書館接收保藏，但有的當作廢書處理，其中有不少是木刻醫書。⁶¹

顧志興為研究地方藏書史的專家，其記述李理山丹井書屋稱其「藏書總數達三萬八千餘冊，約七萬餘卷。」又提及李理山收有原本之四庫全書中的《明文海》十冊。文中稱，據張峯《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敘及文瀾閣庫書咸豐間兵燹，民國間書肆尚有少量原抄本流傳，「尚有《明文海》十冊在杭州福星觀李道士處」；又言「杭州玉皇山福星觀道士李徂徠藏有閣本《明文海》十冊，卷數起迄未詳，前同義烏事（應為前同事義烏——引者按）朱君中翰見如此。」⁶²如此則李理山尚藏有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原抄本《明文海》十冊。⁶³

又據李理山之〈上訴狀〉，自稱其藏書為「古今各種書籍捌仟餘部」，其中包括「上海白雲觀所藏明代正統道藏經壹部捌仟卷」。⁶⁴李

⁶¹ 王松泉：《民國杭州藏書家》，收入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杭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杭垣舊事》，頁36-37。

⁶²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下冊，頁704。

⁶³ 李理山案平反後，浙江圖書館將當年沒收之丹井書屋之藏書發還給杭州道協，據高信一講，其發還之圖書與前相比多有缺少。而上述之《四庫全書》原抄本《明文海》十冊，當不在發還之列。

⁶⁴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藏。

理山所述之「部」之概念當是「種」，其冊數及卷數當如顧志興所述。

(三) 玉皇山福星觀之發展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

1. 玉皇山福星觀建築與經濟概況

玉皇山福星觀是道教全真派在江南五省(蘇、浙、皖、贛、閩)的第一座「子孫叢林」，香火旺盛，遠近聞名。玉皇山自蔣永林起建有七星殿、大殿、二殿、三清殿、斗姆閣、報平堂、客堂、方丈室、石牌坊、南天門等建築。

據《杭州玉皇山志·志餘》，蔣永林建福星觀，第一殿所建為真武殿，其原因是「蔣祖師夢真武帝」：「本觀開山祖師方丈蔣永林律師，建福星觀頭殿真武，所以然者，因有一夕忽夢見真武放龜入湖驅蛇入江，故先建真武殿，至今鄉老尚多傳說如此。」⁶⁵李理山主理觀務後，挖掘了「天乙池」，開闢了「紫來洞」，使玉皇山成為滿山蔥翠、殿宇莊嚴的洞天福地。

隊克勳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專著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⁶⁶其中有“Celebrating the Birthday of Yu Huang Shang Ti”（慶祝玉皇上帝的生日）一篇，記述了隊克勳親自參與的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的過程。隊克勳在書中記述道：

農曆的正月初八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人們要崇拜道教中的最高神——(玉皇上帝)。所以在玉皇上帝生日的這一天，⁶⁷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杭州人在攀登玉皇山的石階。這座山就在閘口村和閘口

⁶⁵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58。

⁶⁶ 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40).

⁶⁷ 玉皇上帝生日是正月初九，但至隊克勳此時(約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香時間卻變成了正月初八，這個問題應當引起重視。《杭俗怡情碎錦》中有「正月初九玉皇山」一條，稱「玉皇聖誕進香，出清波門，過長橋，轉向南，上山由路亭轉右，沿上有七星缸、鎮火方。再上山門，大殿在邊，頂頭有煉丹

火車站的後面。在(玉皇山)山頂的竹林環抱之中，矗立著專門奉獻給玉皇上帝的福星觀。

我們跟隨著香客的隊伍上山……跨入福星觀新裝修過的前殿之後，香客們會把蠟燭和焚香放在(玄天上帝)的面前，而對於大堂兩側的(八天君)和(四元帥)等巨大神像，他們只是偶爾才會瞅上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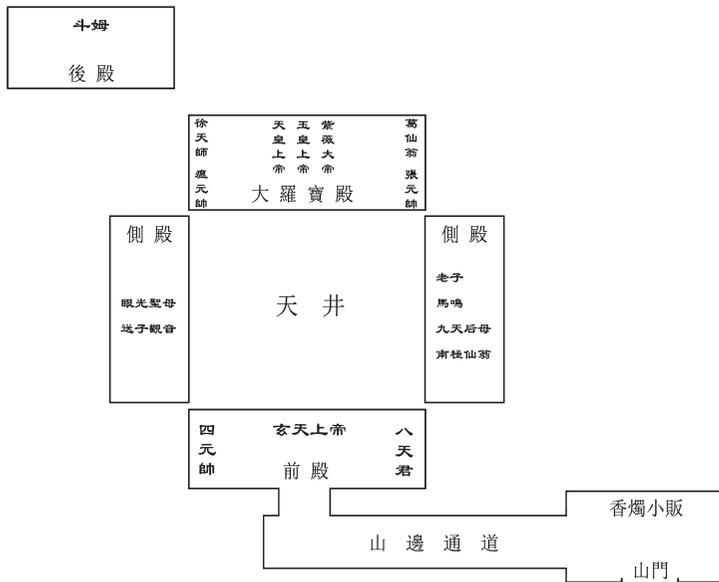
來到作為主殿的(大羅寶殿)之後，香客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前來祝壽的玉皇上帝了。大殿的中央就是統御萬天的玉皇上帝之寶座，左右兩旁分別是統御萬雷的(天皇帝)和統御萬幸的(紫薇大帝)。這三位都戴著掛有一串串珍珠的長方形皇冠，玉皇的皇冠上有十三串珍珠，而其他兩位的皇冠上只有九串。大殿裏在這一天受到崇拜的還有其他幾位道教的神仙，左側是(徐天師)和(瘟元帥)，右邊是(葛仙翁)和(張天師)。……在側殿中也要舉行同樣的崇拜儀式，供奉在觀內右側的是(老子)、騎白馬和持蠶繭的(馬鳴)、(九天後母)、(南極仙翁)；在左側接受燒香的是(眼光聖母)菩薩和(送子觀音)像。跟隨持香的香客們走入後殿之後，我們發現位於中央的是星斗之母(斗母)，給她燒香便可消禍免災，不患任何疾病。福星觀的道士們在早上十點和下午兩點會專門做兩次法事。⁶⁸

台，其山腰過路亭至天真山下麓天隆寺、八卦田。」《杭俗怡情碎錦》因文中有光緒二十八年字樣，故其撰寫的日期約為1902年。也就是直至清末，上玉皇山燒香是正月初九。但到了民國時期上香似變成了正月初八。《申報》民國年(1921)2月16日《杭州快信》中稱：「今日省城赴玉皇山進香男婦不下萬餘人，車水馬龍，不絕於道。勞動界人利市三倍，官廳禁止宿山，派隊徹夜巡邏。」1921年2月16日為正月初九，不過當日報紙所述，當是前一天的事，故該文所述應當是正月初八的事情。但按理文中應該稱「昨日」才對，但文中又稱「今日」，殊不可解，或是作者此稿是前一天寫的原因。故1921年時，上玉皇山燒香的習俗究竟是初八還是初九，這一篇簡單的報導不能夠確證。但隊克勛明確記述了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的事。所以我們認為至少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正月初八到玉皇山上香的習俗正式形成，但仍不清楚從正月初九玉皇聖誕上香演變為正月初八的確切原因。

⁶⁸ 參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26–28. 原文為英文，此為作者譯文。文中括弧中文字本為隊克勛在文中所註的中文，作者翻譯成中文時直接使用了原來的

隊克勳記述了正月初八玉皇山的一天，其中除了香客們的情況，儀式的大致情況外，通過其記述還瞭解到福星觀的神像的大概情況，這是一篇非常寶貴的民國時期玉皇山福星觀的資料。根據其描寫，結合對現在玉皇山福星觀的地理位置的考察，作者繪製了當年玉皇山福星觀的大殿神像位置圖，見圖一。

圖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福星觀殿堂及神像位置簡圖



又據《王芳回憶錄》，毛澤東於建國初年曾到玉皇山參觀，該書描寫了玉皇山上塑像的情況：「一次，我陪他去爬玉皇山。那時，山頂上的廟裏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義》中的主要人物。」⁶⁹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玉皇山福星觀神像

中文註文。譯文參考了沈弘：〈論隊克勳對於杭州地區民間宗教信仰的田野調查〉，《文化藝術研究》，2010年第2期，頁45-61。

⁶⁹ 王芳：《王芳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157。

的記載。

玉皇山的經濟狀況一向較好，從李理山從杭州抱經堂購買古籍「數年之間，耗資數萬元」及郁達夫記述的「現在的道觀，卻是最近的監院紫東李道士的中興工業，聽說已經花去了十餘萬金錢，還沒有完工哩」⁷⁰來看，「玉皇觀當時是中國比較富足的一個寺觀」。⁷¹

福星觀的道士也要參加農業勞動，並稱其為「農林化」。「農林化者，即是以農業生產，並森林種植，籌備道糧，自食其力，不專求人，然後品格清高，外界不致輕視，所謂農業，亦不限定耕田種地，收穫米麥豆菜，凡植物可以充饑，藥草可以療病者，皆在農業範圍以內。森林不限定松杉大木，凡茶葉竹筍，櫻欄桐子，各種果木，只教土地相宜，皆可試種。」⁷²顧彼得曾多次造訪玉皇山，他記載：「李住持總是坐在陰涼處的一把躺椅上，喝一杯寺觀自己種的綠茶。」⁷³「由於喝了太多道觀裏自己種的龍井茶，晚上我躺在房間裏難以入眠。」⁷⁴則是玉皇山自己種植龍井茶，正合於以上「農林化」之說。「農林化」既是玉皇山道士的生存之道，也包含了玉皇山道士對道的理解與實踐。

1951年李理山被軍管會逮捕時，其財產被沒收，據李理山〈上訴狀〉，其中有黃金20兩，美元100元，布150疋，以及元宋明清名人古畫、古董玉器、宋元明清舊拓碑帖、書籍八千部等大批物資，⁷⁵從中可見至解放後福星觀財產亦頗豐。

⁷⁰ 郁達夫：〈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彥編：《郁達夫說杭州》，頁12-15。

⁷¹ 參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50.

⁷²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九〈志餘·農林化〉，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56。

⁷³ 參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02.

⁷⁴ 同上註。

⁷⁵ 據李理山〈上訴狀〉，藏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檔案室。

2. 玉皇山福星觀主管之道院

蔣永林時代，福星觀就主管了一些其他道觀，據《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蔣永林任方丈時「各處紳耆慕道而來，請往餘杭之洞霄宮、杭城之佑聖觀、鎮海之淵德觀、嘉興之玄妙觀、錢塘四鄉之東嶽廟，蔣師悉為之整頓規模，後均派徒分往管理」。民國以後，李理山就任福星觀方丈，因其影響很大，故亦有多處道院由其接管。據《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玉皇山主管之道院如表三所示：

表三：玉皇山主管之道院

| 序號 | 主管道院 | 時間 | 原因 |
|----|----------|------------------|---|
| 1 | 西湖烏石峰金鼓洞 | 民國十餘年 | 原住持仇宗通為本觀支派，羽化後，由本觀派人管理。 |
| 2 | 葛嶺抱樸道院 | 民國二十五年秋 | 染業公所派代表奉聘請書於本觀李紫東，要求接管抱樸道院。 ⁷⁶ |
| 3 | 吳山南麓元妙觀 | 民國十六年 | 該觀地界空地為人霸佔幾盡，原有住持無法清理，遂由十方道眾，請李紫東接管。 |
| 4 | 吳山第一峰伍公廟 |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 杭州第一區區公所區長陸啟致聘書，請本觀李紫東為該廟住持，管理廟務。 |
| 5 | 仁和倉橋朱天廟 | 民國二十年 | 里人及道眾，公推本觀李方丈接管。 |
| 6 | 杭州西大街火神殿 | 上年 ⁷⁷ | 廟產為保管委員會所管理，上年地方人士公請本觀李紫東為住持，於是知照周伯雄君將圖照交出。 |
| 7 | 武康籌山升元觀 | 民國廿六年 | 武康鄉公所收其產，住持黃宗慶請本觀李紫東接收，以處理之。後經交涉，該縣縣長將管理權交與李紫東，為該觀住持，時舊曆甲戌年也。 |
| 8 | 餘杭金築坪天柱觀 | 民國十二年 | 餘杭學界議收其產，後與洞霄宮併案辦理，乃請本觀李紫東接收。 |
| 9 | 大滌山洞霄宮 | 民國十二年 | 餘杭學界將該院田地山場，歸學校收管。後經交涉，該縣地方紳董，乃請本觀李紫東接收管理。 |
| 10 | 鎮海淵德觀 | 民國十七年 | 軍隊駐紮，道務莫振，觀中雜物，亦多損失。於是方丈張明照及道眾與地方人士來請本山李紫東接管。 |

⁷⁶ 梅福與葛洪被染布坊奉為祖師，其原因是梅福和葛洪被認為是染料、顏料及染布方法的發明者，所以抱樸道院才會由染業公所管理。

⁷⁷ 當指本志撰寫之前一年，撰志為民國三十四年，則接管之時當為民國三十三年(1944)。

十處道觀，除金鼓洞一處本為福星觀支派，羽化後，可能沒有合適人選，故仍由福星觀派人管理。其餘有五處，都是道觀有較大的麻煩，觀或將被收，或已被佔，而請李理山出面交涉，最終都成功交涉，並接管。又有四處都是公推或政府出面請李理山接管。從中可以看出李理山在當時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或與其與政府要員有諸多聯繫有關。

3. 玉皇山福星觀之善舉及上海分院的設立

李理山影響力很大與其不遺餘力地進行善舉有一定的關係。李理山的善舉分兩個方面，一是從宗教和諧的角度進行的善舉，二是以公眾為對象的善舉。

(1) 宗教和諧

三教合一 是宋元以來全真教一直提倡的思想，而李理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者，其方式是在經濟上幫助其他宗教的信徒。顧彼得記錄了玉皇山道觀一年一度的宗教間的一次聚會。「這是一個陰鬱的冬天的日子……玉皇觀的院子裏擠滿了和尚和尼姑，不同年齡都有。他們身穿單薄的灰色袍子，因為寒冷而明顯有些發抖……李主持在宗安和其他一些道士的陪同下來到院子裏。僧侶們尊敬甚至熱情地向他們致意，李住持請大家坐下來開始用飯。隨後，他和宗安一桌挨一桌地遞到每一位客人手裏一個小小的紅包，一個裝著錢的紅色小包。」⁷⁸

根據呂宗安的解釋，「這是道觀為自己的佛家兄弟，尤其是那些貧苦的兄弟們安排的每年一次的聚會，道觀為貧苦的出家人準備一頓熱飯並給予他們一定的經濟幫助，以此來表達同情和對其他宗教休戚相關的情意」。當然這種關切不僅僅是對佛教徒。顧彼得說「他

⁷⁸ 參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50.

們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一個基督徒，如果他來到這裏說出他的需求的。」⁷⁹過年的這種聚會，不免有些形式化，但作為宗教領袖，李理山須要通過一些表現形式來表達他的思想和理念，這些形式是必要的。

(2) 善舉與上海福星觀分院的建立

玉皇山的善舉據《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七〈善舉〉及其他文獻，福星觀經常之善舉主要是資助貧困家庭及施藥。

顧彼得在其書中記述了李理山及其弟子們的較為特別的資助方式，「李住持的道士們經常以家中添丁或其他理由作掩飾，去看望一些處於困境中的家庭，喝茶的時候送給他們一個小小的紅包。這樣的方式既能行善又能照顧到被捐助者的臉面。這是一種美德，對此唯一的解釋是因為道(Dao)」。⁸⁰

關於施藥，福星觀「每年於夏季在慈雲嶺⁸¹及禹王廟等處，備有茶湯以供行人渴飲，又備有中國痧藥幾種及十滴水與時疫救急等藥，以防行人之猝然感冒與傳染者」。⁸²

上述兩項是一般寺觀常見的善舉，而福星觀較為特別的一項善舉是，其曾經開辦過一所西式的學校。學校為小學校，其名稱為「慈雲初級小學校」，學校為寄宿，「學生膳宿、書籍、燈火、茶水等費，概由本校供給」。並有教師兩名。不過由於經費的原因，學校只辦理了五年，40名學生畢業後，便停止開辦了。

玉皇山福星觀可以載入國史的善舉則是抗戰初起舉辦「難民收容所」，共收容難民七千餘人。

⁷⁹ 同上註，頁51。

⁸⁰ 同上註，頁176-177。

⁸¹ 慈雲嶺與玉皇山相鄰。慈雲嶺亦有道觀，名慈雲宮。

⁸²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七〈善舉〉，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20。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杭州淪於日寇鐵蹄踐踏之下，錢塘江邊南星橋一帶，房屋全部燒毀，只剩一片廢墟。江邊的老百姓，無衣無食，扶老攜幼，掙扎在死亡線上，流亡逃難。李理山道長義憤填膺，熱血沸騰，出於民族自尊心與愛國感情，他毅然停止了宮觀宗教活動，帶領道眾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敞開了紫來洞道院，收容了一千七百多名上山逃難的難民。猶恐居住不下，又發動道俗群眾一百數十人砍倒山上的毛竹與樹木，緊急搭建起幾十間茅棚，讓難民棲身安定下來。福星觀對難民的「供給」，包括「每日兩粥，任其飽食，不加限制，茶水不斷」。⁸³這許多難民，一日三餐，吃飯用糧的數字很大。坐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糧很快便顆粒無存，眼看要斷炊了。李理山組織人力下山運糧，要通過日寇的崗哨關卡，困難重重。有的被查出，日寇說是給山中抗日遊擊隊偷運糧食，人被折磨，糧食也被搶去。李理山不畏困難冒險下山，通過日寇層層的封鎖，到杭州市去找當時的慈善團體「世界紅卍字會」請求支援。請「紅卍字會」出面打交道、開證明，紅卍字會翻譯章蘭亭作為連絡人，在李理山與日寇之間進行聯繫。終於解決了糧食運送的問題，有時是糧食上了山，而他卻是空腹回到觀中。雖然如此艱難、危險，而他依然認為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李理山道長愛國愛民、濟人之難的高尚品德，在這一時期表現最為鮮明卓越，因而他在道教界及民間也更受尊敬。⁸⁴

由於為難民籌措糧食的過程中，李理山與日寇進行了接觸，這些事件日後卻成為李理山被逮捕的證據之一。其判決書中稱「杭州淪陷時期，被告以辦難民所為名，與日偽紅卍字會漢奸翻譯章蘭亭及

⁸³ 同上註，頁919。

⁸⁴ 據呂宗安〈回憶抗日戰爭期間玉皇山紫來洞改作難民所的經過〉及閔智亭道長所述李理山生平編寫的〈李理山〉資料整理而成，此資料在網上有多人轉載，但不知其最早的出處及作者是誰。

日寇憲兵相勾結……被告曾邀請日寇上山，酒肉款待進行慰勞」。⁸⁵所謂事急從權，為了七千國人的生計，與日寇周旋，無論過程如何，其結果是解決了七千人的生活所需，七千條生命得以延續，李道長可謂功德無量。

難民所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杭州的戰爭逐漸平息下來，難民也紛紛下山謀生，人數漸次減少，玉皇山的難民收容所才告結束。

對於難民，福星觀除解決吃飯問題外，「有衣服不周者，本觀購備照給，新舊均有，不令受凍」。「本觀備有緊要西醫藥水及本國痧藥，間有延請醫生開方服湯藥者。」⁸⁶故福星觀的開銷浩大。山上香火既停，香資功德收入斷絕，漸漸難以為繼。李理山道長於是派徒弟呂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創建了上海玉皇山福星觀分院。

據李理山呈上海社會局的〈呈為申請廟產登記事由〉稱：「自民國二十六年因遭抗戰軍興，杭州山上香火遊客絕跡，道眾生計無法維持，不得已於廿八年春，來申籌劃租屋於本市西康路五八八弄三百號，開設分院承接經懺香火。奈因地方偏僻，所入不敷出，只得另圖相當之處，乃於廿九年春在武定路三十二弄二十號設立第一分院，繼續經懺香火等事，所有收入除開支外，悉數維持杭州各廟道眾等茲奉。」⁸⁷

從上可知，在上海開設的福星觀分院共有兩處，根據〈登記表〉，⁸⁸第一處西康路的稱「杭州玉皇山福星觀道院」，第二處武定路的稱「杭州玉皇山第一分院」，此處亦是上海道教會的會址。又據登記表，兩處道院的創始人均為「李紫東」，而「代理人」均為「呂宗

⁸⁵ 杭州西湖區法院所藏檔案資料〈(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號〉。

⁸⁶ 來裕恂編：《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七〈善舉〉，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21冊，頁919。

⁸⁷ 上海市檔案館藏。

⁸⁸ 全稱是〈上海市社會局宗教團體及寺院申請登記表〉，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填寫，上海市檔案館藏。

安」。這件事，顧彼得在其書中也有記述。「大概兩年後的一天，……宗安說他經常在杭州和上海之間往返已經好幾個月了，把一些傢俱和其他的東西搬過來，因為他們在上海開建了一個玉皇觀的分觀。……寺觀位於西摩路 (Seymour Road) 下方的一條小巷子裏，背靠著一座大佛寺。……李理山住持 (Abbot Lee Lisan) 仍然留在玉皇山，宗安來當上海這座分觀的住持。」⁸⁹

關於福星觀上海的幾家分院，據上海《靜安區志》，於「解放初期收歇」，具體時間則沒有詳細說明。上海檔案館收藏有一份呂宗安與僱員的〈解僱協議書〉，是呂宗安代表「杭州玉皇山福星觀上海第一分院」與「許夏根」、「余如梅」解僱書。在前述〈登記表〉中，兩人均為「茶役」，其待遇為「薪工膳宿」，可見是住在觀中的工人。此解僱書的呈送時間為1952年1月19日。故上海福星觀分院的收歇時間可能是1952年初。

四、結論

二十世紀下半個世紀中，玉皇山福星觀在中國大環境的影響下，逐漸走向了衰落。1954年，玉皇山福星觀進行了修葺。《當代日報》還記述了修葺中的一個小插曲。其報章標題為：「包炳記油漆作承包玉皇山大殿油漆工程偷工減料」。其內容是一封讀者來信，信中稱「編輯同志：本市包炳記油漆作向市人民政府建設局承包玉皇山大殿及雙桂堂全部油漆工程時，偷工減料，……依照規格應該用桐油石膏，但該老闆卻以豬血石膏來代替……」而後「杭州市人民政府建設局」責令其「除油漆剝落嚴重部份當即責令重做外，並已令其登報悔過」。⁹⁰從側面可以證明1954年重新修葺福星觀的事實。但是從這篇文章的內容來看，人民政府建設局負責了玉皇山的修葺工作，則此

⁸⁹ 參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69.

⁹⁰ 《當代日報》，1954年1月8日，第2版。

時福星觀或已經被政府所接管。

1958年，杭州市政府對全市的約46所宮觀進行了合併，保留了5所，為玉皇山福星觀、慈雲宮、葛嶺抱樸道院、黃龍洞及金華廟。福星觀尚在保留之列，但1964年起，交由園林部門管理。⁹¹而後玉皇山一直與道教隔絕，山頂雖然保留了原福星觀的一些建築，但一直作為茶樓在經營。

二十一世紀到來後，玉皇山福星觀迎來了復興的契機。2004年6月10日，達成《玉皇山福星觀、老玉皇宮移交協議書》，⁹²園林部門將這兩個道觀交還由杭州道協管理使用。高信一道長於是開始籌建福星觀大殿，於2007年年末建成開放。

由於杭州有正月初八上玉皇山燒香的習俗，而杭嘉湖地區及蘇南民眾也有至杭州燒香的習俗，故玉皇山從2008年起，每年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十左右這段時間，上山燒香之人可謂人山人海。杭州的報紙曾作過報導稱：「本報訊今天（2009年）正月初八，按老杭州傳統，是去玉皇山登高『燒頭八香』的日子。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春節頭七天，共有11.48萬人登玉皇山，比去年增加9.23%，在收費景區中排第二，僅次於靈隱寺。鳳凰山管理處說，春節七天爬玉皇山，很多是外地遊客組團。正月初八，才是杭州人上山的高峰期。」⁹³

從上面的報導可以看出，玉皇山上香火旺盛，燒香的人絡繹不絕，福星觀正月的收入可能就達百萬以上。筆者曾數次上玉皇山考察，觀中除提供香燭外，還供奉靈位，抽籤解簽，適時還有齋醮儀式。如2009年的農曆七月十五，就有一場黃籙齋，具體名稱為「中元度幽之期恭就本道觀祖師壇前，啟建黃籙薦度幽普濟法會」。其

⁹¹ 任振泰主編：《杭州市志》，第9卷，頁439、444。

⁹²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杭州年鑒2006》（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頁427。

⁹³ 杭州《都市快報》，2009年2月2日，第3版。

內容有「三元滅罪度亡濟幽法 一部」及「薩祖鐵鎖祭煉壹堂」。所祈請的神仙為「三界高真嶽府衆聖」。榜文落款為「太上道宗門下，奉行事小兆臣高信一」。從上述復建後的情況來看，作為道教特徵的齋醮儀式已經在玉皇山恢復，山上的香火旺盛，香客來源很廣，且人數眾多，使得福星觀收入頗豐。從種種跡象來看，玉皇山道教正在走向復興。

歷代以來，道觀的興盛都與政權的支持和名道的出現有關。縱觀近代以來玉皇山道教的發展，晚清與民國時期的輝煌，除了當時地方政府的支持外，主要是出現了蔣永林和李理山兩位高道。而近年來的發展，首先是得益於政府的支持，一紙交還協議讓福星觀又恢復成為道教的宮觀，也使玉皇山道教走向復興之路，不過玉皇山道教要再現晚清民國時的輝煌，還有待於可以媲美於蔣永林、李理山兩位前輩的高道出現。

The Vicissitudes of Daoism on Yuhuang Mountain in Modern History

Han Songtao

Abstract

The Fuxing guan on Yuhuang Mountain, Hangzhou, was rebuilt by Jiang Yonglin from donations during the third year of Emperor Tongzhi (1854).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40–1912)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the Fuxing guan flourished and as a site of a lot of *chuanjie* 傳戒 activities, became a famous Daoist temple in the area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50s, Li Lishan was the master of the Fuxing guan. Li was very proficient in *zhai-jiao* 齋醮 ceremonies, medicines, *wushu* 武術 and *shushu* 數術, and he established Daoist societies in Shanghai and Hangzhou. People esteemed him as a well-known Daoist of the Quanzhen 全真 Order. Li was also an activist, and kept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key officials and influential business men of Shanghai. He initiated all kinds of charities, much appreciated among the masses. The Gardens & Landscapes Bureau took charge of the Fuxing guan in 1964, and relegated its case to the Daoist Society of Hangzhou in 2004. In recent years, the *zhai-jiao* activities and incense offerings at the Fuxing guan have been renewed, leading to a revival of Daoism on Yuhuang Mountain.

Keywords: Daoism, Yuhuang Mountain, Fuxing guan, Li Lishan, Jiang Yonglin